

赵树理

下卷

研究文集

外国学者论赵树理

(日本) 萩野脩二、(美) 马吉芬等著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 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赵树理研究文集

外国学者论赵树理

下卷

(日本) 萩野脩二 (美) 马若芬等著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 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编者的话

本书应该叫《外国学者、作家论赵树理》，为了简明起见，把“作家”二字略去了。

编这本书，我们注意收入各种不同的观点；同时把起始时间提前到四十年代末，这是与前两卷不同的一点。从那时以来，外国学者所写的论文，作家所写的访问记、游记，有关赵树理者不少，可惜读者大都看不到。现在把它们集中到一起，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外国学者所写有关赵树理的研究专著，据我们所知，有两部：一部是日本著名学者、现驹泽大学教授釜屋修先生所著赵树理评传《中国的光荣和悲惨》，另一部是韩国青年学者闵惠贞女士所著《赵树理及其小说研究》；前者出版于1979年11月1日，后者是作者在台湾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所作硕士论文，1993年6月印行。前者将出版单行本，本书就不收了，后者我们选了一章。

编辑这本书，得到了好几位先生的大力支持。黄修己先生编《赵树理研究资料》，收有“国外评论文章选辑”，共九篇，本书大部分收入。日本部分，有几篇是根据釜屋修先生以前提供的复印件，特请董静如女士翻译的。萩野脩二先生是最早访问赵树理故乡的一位外国学者，除两篇论文外，我们还收入了他的一篇访问记。

本书所收，显然只是一小部分。能把这一小部分作为窗口，看到国外赵树理研究的一个轮廓，我们就满意了。

在编辑上有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1995年12月1日

目 次

编者的话	(1)
------	-----

美 国

中国震撼世界(节选)	杰克·贝尔登(1)
共产党中国的小说家——赵树理(节选)	西里尔·贝契(14)
第二阶段的共产小说(节选)	夏志清(23)
赵树理笔下的旧乡村人景	
——谈谈《催粮差》与《刘二和 与王继圣》	马若芬(26)
意在故事构成之中,赵树理的明描暗示	马若芬(33)
美国青年眼中的《小二黑结婚》	郑择魁(46)

日 本

中国的新文艺与赵树理	鹿地 亘(49)
赵树理文学的特色	洲之内 彻(58)
新颖的赵树理文学	竹内 好(68)
赵树理	
——二十世纪作家评传之一	小野 忍(80)
关于赵树理型的小说	竹内 实(91)

《三里湾》之难懂处	仓石 武四郎(97)
访赵树理故居	萩野脩二(102)
关于《三里湾》的评价	加藤 三由纪(111)
两个农民作家	
——伊藤永之介和赵树理	釜屋 修(121)
语言大师赵树理	
——一个用 onomatopoeia 的象征用法	
的探索	萩野脩二(174)
参加赵树理八十诞辰纪念大会	加藤 克巳(181)
日中友好的旅行	桂英 澄(185)
关于他的笑和爱情	
——从赵树理的初期作品	
《有个人》说起	萩野脩二(189)
赵树理与朝鲜族作家李根全	
——瞥见赵树理对中国少数民族	
作家们的影响	柴田 孝(195)
赵树理研究在日本	加藤 三由纪(198)
附：日本赵树理研究资料目录	釜屋修、加藤三由纪(213)

苏 联

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	西维特洛夫、乌克兰节夫(227)
赵树理的创作	费德林(235)
关于赵树理和他的小说(节选)	克里夫佐夫(257)
赵树理小说在苏联	谢列兹涅夫(262)

其他国家

写在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后面(节选)……………〔捷〕普实克(265)

赵树理和中国民族文学(节选)……………〔捷〕普实克(273)

《三里湾》与《花好月圆》之比较……………〔英〕约翰·伯耶(279)

我怎样翻译《小二黑结婚》

——在第三次(国际)赵树理学术

讨论上的发言……………〔挪〕布里特(304)

赵树理,民族文学的“盐”

——访罗马尼亚学者罗扬……………一 丁(306)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韩〕闵惠贞(309)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叙事战略……………〔韩〕李珠鲁(328)

中国震撼世界*（节选）

〔美〕 杰克·贝尔登

邱应觉等译

解放区的农村和美国的城市一样，有时也有恶霸为害。这些恶霸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残余。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不实行分田，地主在农村中保留了经济势力，也保留了政治势力。这样，一个四百人的小村子里，当村长的往往仍是地主，而一个一千人的大村子，村长不是地主就是地主的代理人。

乡村里初次实行选举的时候，地主只须威胁退佃或不准赎回典押于他的土地，就能让人把他选上台。随着农民觉悟的提高，地主就多费些心机。他们雇佣地痞对选民进行恐吓，把心腹安插到点票的关键岗位上，或是往自家候选人的碗里多塞些豆子。

解放区鼎鼎有名的作家赵树理，在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把这种舞弊现象描写得很详细。小说的主人公李有才，是个老羊倌。多年来，他把村里的人和事编成快板，给自己和老伙计们解闷。八路军来到了李有才那个村里，告诉老乡们，现在民主了，大家应当自己选举村长，于是地主阎恒元就马上当选为村长。年年选举一次，年年阎恒元当选。对于这件事，李羊倌编了下面一段快板进行讽刺：

* 节选自本书第四章《一个政府的诞生》。据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
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
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地主被李有才的快板弄得狼狈不堪，就不再当村长了，但却设法让自己的一名亲信被选为村长。一切还是老样子，因为新村长对老村长唯命是从。为了揭露这一情况，李有才给地主及其傀儡村长又编了一段快板。

村里的穷人开心地传唱着李有才的快板。地主害怕这位羊倌的影响，就指使村长把他赶出了村子。李有才被迫避居山中，但他的歌却留在人们的心里。最后，人民终于把地主赶下了台，选上了自己的人。李有才返回了村子，又编了一段快板庆祝选举的胜利。

故事简单么？是的。宣传么？不错。不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宣传，是目的崇高的宣传。赵树理讲述了一个村子如何与压制民主作斗争的故事，就等于告诉别的村子，它们也能够打垮压迫者而赢得民主。赵树理还向人民指明，他们必须自己动手为平等而斗争，不能把民主当成共产党或八路军的一种恩赐。

如果认为解放区农村政权的形式是十全十美的，那未免有些虚妄。如果以为八路军或共产党一夜之间就能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欧美那样的民主政府，也是一种主观臆想。文化水平低，

经济原始，这就注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在今后很长时期内都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缺乏经验并不能为共产党人在地方选举中的许多做法开脱。有许多例子说明，他们操纵选举，很少尊重人民的意愿。他们尽是提拔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也就可能给怀有野心的不良分子以掌权之机。在一些村庄，各候选人的政纲都包含一条“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的口号，这就极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的用意并不在建立乌托邦式的民主，而是在培植支持自己的力量。然而，在战争和革命期间，如果指望他们不这么行事，也是可笑的。我与之交谈过的共产党人，大都很坦白地承认，他们需要建立巩固的拥护自己的基础。不过，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所谓“开明人士”，却竭力向我说明，每个村子都是由人民所拥护的人管理。这种说法是可笑的。我发现，在不少村庄里，老百姓对当地官员是怨恨的。我见过一位农村姑娘，她非常热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但是这位姑娘与许多追求新贵的女人不同，她对我说：“我不愿意嫁给干部，他们都是些想升官发财、不管老百姓的家伙。”当然，观点相反的姑娘也有的是。

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如果一个五百人的村子是由一个一百五十人的农民协会发号施令进行管理，而不再是由一个有权势的地主任任意统治，这当然应该看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

国民党、蒋介石总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必

须先实行一个时期的训政。解放区的领导人嘲笑了这种理论。

“在施行民主之前，先训练人民，这是毫无用处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对我说，“人民要是过上了民主生活，习惯自然会改变。只有体验民主，才能学会民主。”

十七、赵树理

严格地说，本书这部分章节是写政府的，不该写他。不过，他是作为不速之客闯进我的房间的，那么，也就顺便介绍一下他的身世吧。

这天一清早就下雪。我坐在我那石板地的屋子里，感到有些郁闷和孤独。这时，他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他像私塾先生似地鞠了个躬，就在我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垂下眼皮，从我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嗑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会儿，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我想。

但是走进我屋里烤火的其貌不扬的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他就叫赵树理，是个作家，我在上一章里引用了他的作品。

我同赵树理愉快地度过了两天，可是我不认为我对他很了解。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有着奇特的经历。他与杨教授不同。杨教授投奔共产党，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赵树理投奔八路，却由于他不见容于中国封建旧社会。比起杨教授来，他的身世也许更能说明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太岳地区的一个小城镇。他是一贫农的次

子。家里有八口人，靠着种十七、八亩土地为生。为了糊口，他不得不拼命地干活。冬天到煤窑外捡煤，其余时间就在地里流汗。

赵树理小时候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特别爱好戏剧和音乐。他很小就学会了敲鼓、打钹、击节、吹笛、唱戏，而且很出色，于是村里的成年人就让他参加了“八音社”。这种熏陶为他以后给八路军写戏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赵树理的祖父是个读书人，从小教他读四书五经。他让赵树理信奉三合教，这是一种把佛、道、儒三教教义揉合起来的宗教，强调行善致福。赵树理有一种善恶之行的记录，做了好事就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就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两颗。坏事中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赵树理的白豆总是比黑豆多。

赵树理的父亲相信，仕进之道仍然和皇朝时代一样，要靠读书，便送赵树理读小学。小学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那一套。由于祖父早先的训诲，赵树理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赵树理上不起中学，便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可以免缴膳宿费。在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书里，他第一次读到他那山沟之外的现代世界，了解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如乔治·华盛顿的事迹、法国革命、工业化时代等。他在那里找到屠格涅夫和易卜生的译本，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这时，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媳妇，他便尽义务似地结了婚。新婚后同妻子住了几天就返回学校了。过了两年，他成为一群学生中的核心人物。这群学生是由二十个“思想进步”的分子所组成，他们认为课本中无用的古文太多，科学的内容太少。这些反抗分子对校长进行了指责，这位校长在筹款盖科学馆时贪污，结果只盖成了一间空房子，除了几只桌椅外，什么仪器也没有。这

件事激起了公愤，校长被撤职了。新来的校长显然遵照军阀阎锡山总部的指示，把赵树理和其他五个同学开除了，说他们是共产党。

那是1927年，蒋介石刚刚在上海同“赤党”决裂不久。那时在中国被指为共产党比今日在美国被指为共产党要可怕得多。赵树理根本没有见过共产党，也从未看过共产党的书籍，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除了回老家，别无他途。

他种了一个时期的地，教过和尚识字，后来到一个小学任教，校长是个地主，也是当地的大债主。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负债的农民拿着酒肉到学堂里请校长吃席，求他不要没收他们典出的土地。酒席有时要吃到凌晨三点钟，校长要到下午才能起来上课。教员们也颓丧起来，抽上了鸦片烟。

大约就在这一期间，赵树理的妻子死了，赵树理便回家料理丧事。丧事完后的第一天，军阀阎锡山的特务把他逮捕了，押送到省城太原，和一些学生一道，投入一座专门关押共产党的监狱。

狱吏对赵树理等人说，只要他们写出反共的文章，就可以获释。赵树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起码知识。狱吏嘲讽地把几本共产党的小册子扔进牢房，说：“喂，这就是共产主义。你们写文章批它吧！”

这简直等于扔给赵树理一把开启精神牢房的钥匙，虽然打不开通往自由的门，却打开了这个小伙子的心扉。他告诉我：“共产党猛烈抨击中国封建旧社会，号召建立新社会，把我吸引住了。我正苦于不能解脱旧传统的羁绊，共产党的理论使我豁然开朗。”这位年轻的囚徒虽然在肌体上挨饿，但是在精神上却获得丰富的食粮。

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后，赵树理获释了。他虽然从未见过共产

党，但是由于残酷的折磨，由于读了狱吏给他的材料，他成了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很想找到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赤匪”，可是怎么也碰不到。他的思想渐渐地有些颓丧。

他找不到教书的工作，于是靠卖文章糊口。他给两家报纸的副刊投稿，每千字大洋一块钱。他的文章写的是饥一天饱一天的流浪汉，影射社会的恶劣环境。“我写我所熟悉的生活，”赵树理说，“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说出来，我只能写得很隐晦。最苦恼的是，我维持不了生计。”其中一家报纸因为编辑写了一篇批评阎锡山的文章，被封闭了。赵树理无以为生，只好回农村老家了。他父亲对他的落魄很是生气，他回答道：“这不能怪我。非得整个社会变了，咱们的家运才能好转，不然咱家就得穷下去。”

“我父亲根本就不理会我这一番话”，赵树理说，“他觉得我应该再娶个媳妇。而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亲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可是在那种旧社会里我只能采取这种态度。”

赵树理续弦不久，又离开了家，到达黄河南畔的开封，在朋友的书店里当店员。他希望这回能有个牢靠饭碗。可是，他来开封不久，蒋介石的官员们为了展宽街道，把书店拆了。赵树理只好又回家去。

这时，发生了一件西方人难以相信的奇事，但是，这种事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典型的，并足以说明普通中国人某些行为的根源。赵树理在回家途中路过黄河大桥时，被警察拦住搜查行李卷，那里面包了一条毛巾、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四块银元。通过了搜查之后，他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店里停留过夜。他躺下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有四个人在说只有会门

中才用的黑话。这引动了他的好奇心，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只听一个人说，从开封来了个汉子，身上有四块大洋。他断定这帮人是土匪，一定是从警察那里得了他的情报。他怕被绑票，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抽着劣等的大烟，想显出穷酸的样子，免得土匪注意。

可是，他的行动还是引起了那四个人的怀疑，他们尾随他回到太原。赵树理被弄得很紧张。他到太原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朋友处投宿。晚上，赵树理开始给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突然，与邻屋隔开的墙上响起了重重的、严厉的敲击声，赵树理吓得闭上了嘴。以后的几天，只要他一开口想说，就有敲墙声。他想，准是那帮人觉得他发现了他们的一些秘密，所以警告他不要多嘴。

赵树理料定自己要惨遭不测，他对于自己悲惨的生命并不怎么留恋，但很不愿连累朋友，于是决定跑去自杀。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是一种极深刻的揭露，而且也说明赵树理当时无谓的轻生厌世思想。他对谁都没有说，就投入太原的湖中。

有人把他捞了上来，他在警察局里恢复了知觉，然后像一条挨过鞭打的狗似的回到朋友的住所。同蒋介石特务机关有勾结的帮会立刻在大学里散布谣言，说赵树理疯了，还诱使一家报纸刊登这种消息。学生们都嚷嚷起来，纷纷要求赵树理的朋友把“疯子”赶走。赵树理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又想起自己过去的勿损人、只行善的宗教信条，便不去争辩。帮会派了一个人告诉赵树理的朋友，有个地方可以给赵树理治病，赵树理便顺从地跟那人走了。

那人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那里有很多逃荒要饭的人和土匪，这个地方就叫“满洲坟”。土匪把赵树理安置在一个馒头师傅的家里。“这位师傅待人好极了，你跟他过会满意的。”他们说。师傅显得非常友好，专给赵树理做了馒头和烙饼。馒头和烙

饼很好吃，可是有股怪味。没有几天，赵树理的牙床就出血了，他断定人家给他下了砒霜。“他们用了一种药来减弱毒性，”赵树理说，“他们想慢慢毒死我，这样可以不留痕迹。”他每次吃一块怪味烙饼，师傅就的本子上记录一次。“好，好好地吃。”师傅总这么说，并带着怂恿的神情朝赵树理微笑。

土匪们有自己的黑话。他们要杀一个人，就说：“闺女要出嫁了。”他们给赵树理吃毒药时，也用黑话说毒药的用量，如说“棉价一毛”或“麦价三毛”之类的话，表示每天在烙饼中的砒霜用量。

赵树理对活下去已不抱希望，他继续吃饼，日渐虚弱，但是什么话也不说。他那漠然处之的态度使土匪也感到惊奇。他们觉得犯不上把这种绝望的人杀掉。有一天，当他们转移巢穴的时候，就把他放了。

赵树理从满洲坟回来后，一个朋友给他在乡村师范学校找了个工作。这时正是日本侵华的前夕。在山西的知识分子中，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可是阎锡山不允许示威，也不允许任何公开的反日宣传。这回，赵树理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统治者的义愤有了真正的理由，而且还找到志同道合者。每天下午，他和两个教员都把校园大门锁上，举行违禁的反日会议。

日本入侵中国后，赵树理参加了薄一波组织的牺牲同盟会，上了山。不久，他孤身一人在农村里，阎锡山的县官都跑光了。他决定自己当县官，可是上任头三天他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老百姓都逃到森林和山洞里藏起来了。蒋介石溃兵的掳掠行为，吓得人们不敢回家。赵树理硬着头皮来到士兵中间，这些士兵正在乱挖老乡埋藏的粮食。他们恨不得把逃走的农民抓来杀光。他劝士兵不要毁坏家具当柴烧，不要搜粮食。他说得很和气，用

了一些格言成语，可是心里却很紧张。他说：“你们要是能这样做，老百姓就会回来，给你们弄粮食。”赵树理用这种办法使士兵和老百姓和解了，也忘却了个人的烦恼。

他成了游击队的干部，游荡了两年，最后同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开始搞宣传写作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使他有会告诉士兵和老百姓要和睦相处；他喜欢八路军，因为在他看来，八路军亲近穷人，接近他自己的生活会。1940年，八路军办了一个报纸，赵树理参加了编辑工作。由于日军的进攻，编辑部分成两部分。一连四年，赵树理总是在流动，一会儿写文章，一会儿打仗，但是他并未感到像过去做“文丐”那样低人一等。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他有了较多的时间，开始为报纸的副刊创作短篇小说。他的一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这篇小说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为了婚姻自由而与父母、与全村作斗争的故事。边区政府把这篇小说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是赵树理创作道路的开端，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又写了六七本书和几个剧本。他从此名扬解放区以至蒋管区。在蒋管区的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等，把他誉为新文学的魁首。

赵树理并没有从销售他的书中得到版税。我觉得他的生活并不比过去好多少，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他觉得好笑。“你知道在中国‘文丐’是什么意思吗？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办法出版。中国大多数作家是付钱给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商付钱给作家。没钱就别想出书。关于群众运动的书就更不能出了。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再说，在这种时候，我赚钱干什么？有志愿战士，就有志愿文化人。正因为如此，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

“不过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在边